

· 孟繁华文集 ·

梦幻与宿命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孟繁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孟繁华文集 ·

梦幻与宿命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孟繁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孟繁华文集)

ISBN 978-7-02-012464-0

I. ①梦…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893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2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 3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64-0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孟繁华，祖籍山东，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游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等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评论400余篇，部分著述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批评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

孟 繁 华 文 集

《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

《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

《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

《1978：激情岁月》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作家作品》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思潮》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现场》

责任编辑：付如初

封面设计：李思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自序

1978年初中毕业十年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入学后,给我们78级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一口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出生于1910年的林先生,1978年已经68岁了。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手里举着一支粉笔便走向讲台。林先生讲的是亚述学。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而“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除了我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

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是名系。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都在那里任教。1982年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任教,从那时起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专业教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院校差别很大,教师基本是组织教学,聘请国内各学科造诣较高的学者做主讲教师,本校教师做的应该是

教辅一类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本学科最好的老师。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刘锡庆教授等，就是我在电大组织课程时开始接触的。在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课程时，也就是1983—1984年期间，我也有机会先后见到了晓雪、流沙河、周克芹、刘宾雁、刘绍棠、李国文、张弦、李准、叶文玲、汤吉夫、路遥、雷抒雁、张抗抗等著名作家，这些当然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另外一种有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

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然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谢先生以“批评家周末”的沙龙形式教学，既是上课也是讨论。洪子诚老师以及陈晓明、王宁、韩毓海、旷新年等学者，都参加过这个沙龙。这个沙龙坚持了十年，在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谢先生被称为北大民主的象征，科学的象征是严家炎先生。谢先生民主、宽容，但做起事来极为认真。他除了组织学生上课讨论之外，还先后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或书系多种，有的大型书系我以“跑龙套”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组织工作。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到北大学习，使我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学术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客观地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北大开始的，或者说，是老师谢冕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是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研究条件、学术气氛和研究水准在国内都堪称一流。我的主要学术著作和文章，大都是在文学所完成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所。

张炯、樊骏、杜书瀛、陈骏涛、董乃斌、赵园等学术前辈，既是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榜样；汪晖、陈晓明、蒋寅、许明、吕微、李洁非、陈福民、靳大成、彭亚非等同事风华正茂，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抱负，都曾深刻地影响着我。

后来，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

究所所长,工作至今。沈阳师范大学不是名校,但它是一所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大学。学校给我的学术空间和特别支持,我深怀感激。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议论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受到“歧视”的学科。任何人都可以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只因为它“没有学问”。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是否“有学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见识和见解。不是说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有学问,研究当下的就没有学问。事实上,研究与历史有关的学科,也一定要与当下建立联系。这就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理论、问题、知识等,都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历史的阐释和处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上游”学科的知识、没有西方的理论和创作知识,想做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显然有偏见,是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缺乏了解的表现。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学科更重要,而是说,客观地看待一个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可以使我们少犯或者不犯常识性的无聊错误。

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神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

以上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和批评工作的简单履历,无甚新意。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接受出版这套文集。尤其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她的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她的工作避免了

文集中的一些问题。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我的老师、学生 and 朋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红尘滚滚的人间才如此可爱,枯燥的学术活动才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和从事。

2016 年 9 月 22 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导论	1
一、儒家理想与文人心态的基本矛盾	5
二、思想情感方式的断裂及再造	14
三、知识分子走向民众的精神地位	22
第一章 浪漫时代的精神向往	33
一、追随大众的乡村之恋	36
二、拒斥城市的道德理想	45
三、精神解放的示喻	55
四、暴力崇尚与意力叙事	68
五、群体精神的峰巅体验	80
第二章 “一体化”时代的精神矛盾	95
一、精神蜕变的自我苦斗	99
二、心灵孤旅：抒情在别处	108
三、“突围”欲望及迫力下的回归	118
第三章 延宕历史的精神重建	132
一、被追怀的精神传统	134
二、想象“人”的苍凉之美	144
三、反抗绝望：“自我”的复活	156
四、启蒙角色再定位	170
五、忏悔中的道义情怀	183
第四章 体验自由与精神跌落	198
一、闲适和静观	203

二、自弃与幻灭	211
三、粗陋的流行	220
四、体验自由和“精神圣战”	230
结语：走向独立的精神之路	243
后记	249

导 论

当代中国文学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半个世纪的风云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显得格外漫长。当代中国文学作为社会中心话语的表意形式,作为时代敏感和备受关注的领域,更是异常复杂而清晰地转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同时,那里更明确地蕴含着当代中国作家复杂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向往的全部痛苦与欢愉,追求与寄托,蕴含着他们与社会生活时而适应快乐,时而压抑焦虑,时而有了家园归宿般的平静,时而又迷茫丛生般的沮丧等复杂的心态。社会历史处境决定了作家心态的生成和发展,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向度,它们互为表里,相互规约。因此,从作家心态的曲折变化入手,梳理并描述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总结文学与社会生活、与中心话语、与文化历史遗传的诸种关系,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多样的心态与丰富的文学现象无可置疑地构成了作家的心灵史,但我们毕竟不可能无一遗漏地“如实”叙述它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选择与局限已先于我们而存在。但任何概括和描述都将连同作者的“偏见”一起写进本文,这是我们的“宿命”。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将着重从社会中心话语(制度化规约)和历史精神遗传(非制度化规约)两个方面来讨论作家心态的发展变化,从而实现对当代中国作家心态的“如实”探讨。

我们都已注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话语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这是我们的现实处境,任何人的行为方式或心理状态无不与这一处境密切相关。甚至人们最生活化的服饰或称谓的变化,都无不体现出意识形态的紧张或开放的变迁,对于极其敏感和备受重视的文

学创作来说自是不言而喻。意识形态是历史精神的权威发出者或阐释者,或者说,历史精神主要是由意识形态话语体现的,它具有“制度化”的功能,它所倡导和抵制的不允许无视和超越,它无处不在的制约力使每个作家必须认真考虑并实行。考察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每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现象,作家或作品几乎都与历史精神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何况许多思潮、现象或作品本身就来自于对历史精神的阐释或转述。

但是,作家心态或文学创作作为人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它又不仅仅表现为受历史精神的鼓励或制约,刺激或抑制。除了这些自身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之外,它与“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自我塑造、表达方式等又息息相关。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之一。“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犹如对原型批评给以很大影响的列维-布留尔所描述的,它是一种“集体表象”。“所谓集体表象,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有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特征来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①荣格发展了布留尔的理论,并将自己的发展命名为“集体无意识”。在荣格看来,“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征,作者愿称其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的。作者将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②荣格的这一发现对解说人类的文化心理遗传无疑提供了新的视野,但他认为杰出的艺术创造都源于神话与集体无意识,则使他又临近了绝对性的边缘,即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

作家心态一般来说由相对稳定和相对活跃的两部分构成。相对稳定的这部分基本可看作是来自于民族的文化遗传,它是“非制度化”的产物,它不受外部力量的控制和干预,比如价值取向、思想情感方式、道德标准等,常常构成人的内在的“文化指令”,每个民族几乎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出这一“文化指令”的原型。它既属于“个人心

理性质的文化”，同时也属于“集团的超个人性质的文化”。^③这一原型文化的衍生和发展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内容。比如中国“士”文化中的使命意识、忧患情怀、依附性格、尊经法古、重义轻利等，虽经近现代“文化革命”的巨大冲击甚至批判，但至今仍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构成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它潜在的影响和作用依然存在。这些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遗传一旦在社会动荡、转型、倾斜时发生，知识分子便会产生心理的紧张或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无意识”是存在的。

但原型文化既然有一个不断播散的过程，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在播散的过程中，一部分被扬弃挥发掉而丧失了延续的可能，被肯定认同的新的基因替代并加入了播散过程。因此，文化遗传也始终处于不断改造、创造的运动之中。新的文化基因是活跃的，同时也是不稳定的，在播散过程中既可能被接受而得以延续，亦可能很快就遭到淘汰。历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取舍，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着作家的态度。作家心态中较活跃的相对不稳定的因素，基本来自于历史精神的感召和作家主体的积极选择或被动接受。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现实迫使他们对历史精神作出应有的回应，不同的回应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表达方式、精神地位、艺术生命甚至整个人生的命运。因此在当代中国，作家心态与历史精神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的研究方法将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这是一种传统的但也是较成熟的批评方法之一，长期被运用于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长期以来，它曾被不适当地尊为权威的甚至是唯一具有“合法性”地位的研究方法。而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的庸俗化倾向日益严重而成为“庸俗的社会历史批评”，并成为历次批判运动的主要工具和武器。一方面，社会历史批评被“庸俗化”多年的“劣迹”搞得声名狼藉，人们一提起它首先想到的是它多年来被庸俗化了的那副面孔。因此，十多年来在各种新方法纷纷被应用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同时，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也进行了一次无情的清算。但这仅

仅是社会历史批评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单一的方法已无法适应日益多样的文学现象和对文学史研究日益多样化要求的需要。因此,它遭到研究者的厌倦或抛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情绪化的驱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得起追问则大可怀疑,它的生命力和有效性是否真的已经终结同样值得认真思考。

事实上,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在批判、解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在不同层面汲取了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充实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新历史主义在批判、修正了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编纂学之后,特别提出了对阐释语境的理解和分析。在研究“写作语境”“接受语境”“批评语境”^④的基础上,新历史主义强调“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互相推动的过程”。^⑤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汤姆金斯也认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永远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对读什么样的作品,写什么样的作品,人们一直不断地进行选择,因此对价值的判断也会发生变化。人们的兴趣爱好,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价值体系内产生的,所以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必须是依照历史条件的变化决定的。就是说,要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把它重新置于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了解它产生和形成的条件与方式,了解它怎样形成自身的特点,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⑥这些看法不难看出社会历史批评的某些影响。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虽然批判了正统的文艺与社会关系说,但他们立论的根据仍然没有超出社会历史范畴;弗罗姆对人的解放、自由、异化的研究,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人的“单向度”的研究等“社会批判理论”,都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并获得结论的。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学理论是由特定历史阶段决定的,他甚至不无偏执地认为,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

在德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赫·绍伊尔在《文学史写作问题》^⑦一文中,考察了自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文学史写作的诸问题。其中方法的问题仍是中心话题。他论证分析了自

1776年赫尔德的第一部文集《论近代德国文学》的“整体图像”说开始,对施莱格尔兄弟的“浪漫美学”、路德维希的“祖国文学史”、格尔维努斯的“时代史”,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到20世纪的“作为精神科学的文学史”“文本批评法”“阐释艺术”等,逐一作了评述或批判,但他在展望未来的写作时仍说:“文学史的写作应当在生产和作用史的广阔视野中观照文学作品,应当架设一座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应当把文学既看作是一种审美构造,又理解为一种历史产物。文学史只能构建一种框架,设计出一幅拼镶画,还有许多色彩斑斓的石头应当填补到这幅画中去。这种暂时性和不完整性是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无法避免的。”^⑧这些看法无疑都在说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补充或完善了许多新的方法论,它并没有因“庸俗社会学”的泛滥而失去生命力和有效性。同样,这一论证也并不意味着拒斥其他方法的合理性和创造意义,愚蠢地重新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定为一尊。需要说明的恰恰是另一面,当我决定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研究当代作家心态与历史精神的复杂关系时,必须同时借助于其他新方法的帮助或启发。方法论的互补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一、儒家理想与文人心态的基本矛盾

1. 儒家理想与文人心态模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绵延不绝两千余年,以主流的形式对后世尤其对传统文人和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它的博大精深显示了东方的智慧,以其独特性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发出悠长而久远的回响。

儒家思想自创立始,便为传统文人设计了理想的人生道路,这一理想的设计成为几十代传统文人终生向往与奋斗的目标,它的实现与否标示了人生的成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在儒家看来,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最理想的人

生选择,也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⑨只有治国平天下“应帝王”“做宰辅”才是人生正道。而“学稼”“学为圃”的樊迟则被孔子斥为没有出息的“小人”。

要实现这一理想,通过仕途跻身于官僚集团是唯一的通道,“士之仕也,犹如农夫之耕也”。“学而优则仕”是两千余年传统文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历代官制经由任命、“辟地”“胜敌”“九品中正制”等各种形式逐渐过渡到隋唐以降的“试策”取士和“科举”取士,积极从政的传统文人便纷纷踏上了通往理想的狭窄道路,一个个儒生满怀神圣与建功立业的梦幻,头戴方巾、端庄儒雅地从四面八方科举圣地走来,终生为此追逐而乐此不疲。因此,中国读书明理的传统文人们便自觉地承当了国家官僚机构整装待命的庞大的预备队。一旦金榜题名,儒生的命运便即刻改变,它不仅光宗耀祖辉映乡里,同时使儒生的心态焕然一新,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正是成功者的心态写照。因此,科举取士聚集了文人焦虑的目光和内心欲望。唐代虽出现过“野无遗贤”^⑩奸佞弄权的把戏,在元代也曾废止科举八十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后来文人参加科举的热情和终生锲而不舍的努力。据资料介绍,清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各省举人中有九十岁者一名,八十多岁者二十名,七十多岁者五名。^⑪封建王朝的末世,文人学士对功名仍孜孜以求,可见这一传统影响的持久和深远。

儒家理想的人生道路和唯一实现途径,严格地规约了传统文人的心态模型和行为模式。对现实的态度,儒家倡导积极的人世精神和参与意识,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看作是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视身负使命,有救世明道的天然义务。因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⑫既要积极入世,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只有走为官入仕的实用政治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这与道家的遁世隐逸、怡然自得的道骨仙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历代儒生的共识。